

## 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第21届年会综述

2019年11月2—3日,由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主办、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承办的“新中国七十年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暨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第21届年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辽宁大学、国防大学等40多所高校的百余位学者出席了会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管理世界》《经济学动态》《经济与管理研究》等多家媒体和期刊代表参加了会议。专家学者们围绕“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主题,展开了深入的学术交流。

### 一、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的优势,探究其中的内在逻辑具有重大意义。

与会专家认为,新中国70年以来的辉煌成就得益于始终坚持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南开大学何自力教授提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中国经济发展理论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对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重要贡献。南开大学张仁德教授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先后所经历的两次所有制结构调整,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运用和重大发展。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进行“一化三改造”,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二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采用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方式,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四川大学张衡教授认为,断定工业化、创造绝对优势违背比较优势原理,这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应该重新回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汲取营养,创造绝对优势的物质技术基础。

一些学者分析了西方发展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趋势。武汉大学郭熙保教授认为,近20年来发展经济学微观化倾向越来越显著,重要标志就是随机对照试验方法的广泛使用,而发展经济学应该使用长期动态分析方法,采取结构性分析思路,注重发展问题的综合性分析。中国人民大学贾根良教授对此表示赞同,认为发展经济学微观化的趋势值得警惕,并对后发优势概念进行了正本清源,指出技术赶超国家“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是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第二种境界。

针对新中国70年以来经济制度、生产方式的变迁与发展,不同学者各抒己见。浙江大学丁堡骏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跨越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是唯一能够对此进行说明的理论。复旦大学孟捷教授则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与中国没有关系,因为跨越卡夫丁峡谷必须以发达国家爆发革命为前提。在实际历史过程中,国家既是推动制度变迁的外部力量,其自身之形成也构成了这一制度变迁的内在组成部分,正是这一特点使得国家理论相应地成为一切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北京大学付才辉教授从新古典经济学和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解释,跳出马尔萨斯陷阱的根本在于禀赋结构的转型,进而改变最优的生产方式。

### 二、高质量发展及其实现路径

高质量发展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表述,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高质量发展及其实现路径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南开大学刘凤义教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具体探讨了劳动力再生产中的质量和数量关系,劳动力高质量再生产的自然基础、社会基础以及衡量劳动力质量的指标等。复旦大学周文教授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并

指出需要厚植经济学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底蕴,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

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上,与会专家认为,应当积极推动脱贫攻坚向高质量阶段迈进。中央民族大学黄泰岩教授针对新时代“兴边富民”战略问题强调,在现有的精准扶贫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夯实脱贫致富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利用边境地区独特的区位优势,迎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机遇。四川大学教授蒋永穆认为,“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是实现高质量精准脱贫的必然要求。中央民族大学张丽君教授提出,东西扶贫协作治理模式是边境民族地区实现资源跨区域调配,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拓宽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治理的重要手段。

学者们针对持续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发表了诸多建议。辽宁大学林木西教授提出,当前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差异问题、省域发展的中心—外围问题、流域发展和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要加强城乡一体化,推进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发展。同济大学林善浪教授认为,中国目前身处经济社会结构变革时期,城市群结构、空间结构正在经历大重组阶段,影响产业结构、规模等级的重要因素是由科教资源、政治资源、生态环境质量、城市功能、城市活力等方面构成的地方品质。

学者们以东北振兴为例,聚焦东北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吉林大学宋冬林教授强调,新时代东北振兴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和联系性的性质,是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环境的深刻历史性变革,事关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系统性重塑和整体性重构。黑龙江大学乔榛教授进一步回顾了70年的东北发展历程,解释了东北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由此得出,一个地区的经济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大势是否契合是决定该地区发展程度的最重要根据。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探讨其创新与发展具有与时俱进的意义。

学者们梳理了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战略理论70年的发展历程与演进阶段、制度结构的特点、主要矛盾与解决方案。天津师范大学李家祥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战略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特色标志,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重要贡献,揭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经验。天津师范大学吕景春教授基于一个CSSA的分析框架,归纳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每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后。新时代内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制度结构正在形成,而外在的制度结构呈现出“挑战性”和“全球化”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谢富胜教授认为,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应当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在国企改革、金融体系发展等实践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北京师范大学戚聿东教授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恰逢国有企业改革40年,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国企的显著优势必须坚持,国企的问题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得以完善。吉林大学李政教授从新中国70年国有企业功能演进和制度变迁看国有企业的未来发展,认为国有企业的功能是不不断演进的,与之相适应,国有企业的制度形态也不断变迁和创新发展。南开大学梁琪教授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应该构建为人民服务的金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体系,未来金融发展要建立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前提下,发展能够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发展能够为人民服务的金融。

同时,新中国创新模式的演化与升级需要科学准确把握政府与市场关系。北京师范大学沈越教授从创新策动主体出发,把形式多样的创新类型抽象为由个人、企业和政府主导的三种创新的理念模式,分析了中国政府主导的创新模式前世、今生和未来发展演变的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胡家勇研究员认为,经济的长期较快稳定增长需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杨娟 赵心慧)

(责任编辑:谭易)

(校对:孙志超)